

史志琼崖



元代书画家赵孟頫笔下的苏东坡像。 资料图

苏轼朋友遍天下，翻开《苏东坡全集》，可以画出一个大大的朋友圈。据粗略统计，苏轼仅留下文字痕迹的友人就超过千人，尤其值得一说的，有穿越之交陶渊明、白居易，有忘年之交欧阳修、米芾，有布衣之交巢谷、卓契顺等。

穿越之交 忘年之交 布衣之交

# 苏轼挚友圈

■ 纪习尚



陶渊明是苏东坡的“偶像”，也是跨时空的挚友。 资料图



巢谷非常羡慕，毅然弃文从武，“蓄弓箭、习骑射”。后来也应过多次武举，但都以落第告终。

从世俗的意义上，巢谷只能算个布衣，与士大夫环绕的苏轼进不了一个圈子。但此人与苏轼“幼而相识”，而且性情“笃有风义”，有侠义之气，苏轼喜欢这样的人。所以当苏轼在黄州，他从老家眉山顺流千里，投奔而来时，苏轼毫不犹豫地收留了他。因为巢谷排行第三，苏轼称他“巢三”。

苏轼以戴罪之身，担任团练大使这样的闲职，大部分时间无事可做。于是在城中得到荒地十余亩，躬耕其中，俨然一介农夫，自号“东坡居士”。巢谷到后，有了用武之地。苏轼在东坡筑屋数间，称为“东坡雪堂”，巢谷就在这里住下，帮苏轼照看这十余亩地。

这年早春的一天，冷风伴着冷雨，苏轼不放心，步行至东坡，看望巢谷。当时的苏轼，手头拮据，能提供给巢谷的生活条件很有限。只见房内破灶败絮，但巢谷“相对不言寒，哀哉知我贫”。

在东坡安顿下来的巢谷，干劲十足。除了带苏轼的两个儿子读读书、练练武，他还把家乡的味道带到了黄州，这让苏轼十分欣慰。巢谷“常亲自煮猪头，灌血精，作姜豉菜羹”，年前还要杀年猪。因他而愈发浓郁的生活气息，让苏轼感觉到这是“人间第一等好事”。

“菜之美者，有吾乡之巢”，苏轼喜欢吃一种类似野豌豆的“巢菜”，巢谷也喜欢。但这种菜唯独巢中有，苏轼离乡十五年，“思而不可得”，于是委托巢谷借回乡之机，寄些种子过来，而且一定要装在布囊里，不要塞在信封里，以防压坏。

收到巢谷寄来的巢菜种子，苏轼将它们种在东坡之下，并将这种菜取名为“元修菜”，以感谢巢谷。巢谷就这样进入了文化史和美食史。

巢谷与苏轼的交往跨越生死。苏轼贬谪海南时，巢谷已经七十多岁了，仍决定万里徒步，见苏轼一面。别人笑他轻狂，他却默默踏上了南下的路。几经周折，巢谷先是到了梅州，见到苏辙。虽然已羸弱多病，他仍然决定继续自己的旅程，渡海到海南，与苏轼相会。苏辙不能劝阻，只能送他盘缠，目送他上路。没想到，巢谷竟在路上遇到强盗，病死异乡。虽没有见到苏轼，却被视为有古人之风的义行。

另一位因为苏轼而名留史册的布衣，是卓契顺。此人曾是苏州定慧寺的一名净人（寺庙里的工作人员）。

苏轼谪居惠州（今属广东）时，苏辙在高安（今属江西），两人各带了一个儿子在身边。苏迈等子侄则留在许昌、宜兴等地。岭南隔绝，他们得不到两位老人的音信，很是担心。卓契顺知道后，让苏迈不必忧虑，惠州又不是在天上，只要走，总归是能到的，他愿意带书信过去，帮忙问候。

卓契顺就靠着两只脚，涉江越岭，风餐露宿，历经了无数艰险。终于在绍圣三年（1096年）年三月二日，抵达惠州，见到苏轼时，他脸晒得黝黑，脚上磨出了一层层茧子。生活在高铁时代的我们，很难理解古代交通的艰难。在宋代，从江南到尚未完全开发的岭南，一个人穿越简直就是拿生命冒险。

拿到写好的回信，卓契顺即将返回。启程前，苏轼问他有什么要求。卓契顺回答得很得体：我正因为无所求，所以才才会来惠州；如果有所求，那我应该到京师去。

苏轼赞赏他的高节，但仍然过意不去，追问了好几次，卓契顺才说：唐人蔡明远是鄱阳的一名小吏，曾是颜真卿的属下，颜真卿北归时，困顿江淮一带，没有饭吃，蔡明远听说后，不远千里送来粮食。颜真卿感念他的真情，写了一幅《蔡明远帖》相送，世人因此知道有个蔡明远。

停了一会，卓契顺问苏东坡能不能援引蔡明远的例子，也为他写一幅字。苏轼欣然从命，写了陶渊明的《归去来兮辞》相赠。送别卓契顺后，苏轼将这件事记录下来，并写信告诉朋友。卓契顺的愿望实现了，于是，如今世人仍记得他和苏轼之间仅有一面之缘却流传千古的情义。

位于江苏无锡的巢谷墓。 资料图

文博苑

## 一枚百年印鉴 牵出一段牛事

■ 高永南

海南民俗博物馆陈列近百枚木质、石质印章，它们多是道公符印，或私印、闲章，只有一枚是官方的印鉴，可能是旧日最低级别的官印。

2011年7月，笔者因收集琼北系列古匾背后的故事，多次到访海口市西秀镇博养村，一天在某位村民家发现了一枚特别的印鉴。该印呈四方梯台状，木质，底面有字刻，印面磨损比较严重，满是灰垢，上面凿小方孔，用于安装手柄，不过手柄已然不存。看到笔者喜爱有加，主人慷慨相赠。

印面4.7厘米×4.7厘米，高4厘米，台面4×4厘米，手柄方孔呈1厘米正方形。

细细清理之后，蘸印泥打章，只见印面为20个隶体字刻：“琼山县防除牛瘟注射办事处那流市分处之图记。”结体扁方，布列均整，点画灵动，爽快内敛，非一般书家、刻家所能为。

旧时文书、契约、碑匾，多见县级衙门以上官府印鉴，实物也偶有所见。古时候，我国有“国权不下县，县下惟宗族，宗族皆自治，自治靠伦理”之说，说的是县以下不派遣朝廷官员，也就没有官印。但此印却为民国琼山县衙下属机构“防除牛瘟注射办事处”派出机构驻“那流市”的“图记（印章）”。

据《长流志》记载，西汉元封元年（前110年），伏波将军平定南越，进兵海南，在长流北部登陆，相传焚烧楼船以示背水一战，后称此地为“烈楼”，明代设烈楼都，隶属琼山县五原乡。民国初年，“都”改为“图”，烈楼都属地分设烈楼、凤楼、兴政三图。1928年，“烈楼”改称“那流”，1947年又改称“长流”。

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，人口增加，清末民初特种行业比如公安警察、防灾防疫等国家机构开始向县以下派驻单位，其时各地可见警察所（长流地区设那流团局）。

据海南史志网介绍：民国九年（1920年）昌江县牛瘟遍及全县，耕牛死亡率达95%；民国二十七年（1938年）秋冬，琼山县70%以上耕牛发病死亡，大多数村庄无牛耕种；在此之前，未见记载，恐怕各地极少发生牛瘟；“1956年在全国范围内消灭了牛瘟”。

因此，原琼山县政府设立“防除牛瘟注射办事处”，随即那流市相应设立防除牛瘟的分支机构，并雕刻印鉴，以便行政。

查阅《长流志·畜牧业》可知，1949年，长流地区农户养牛2051头。再早些，数量可能少不了多少，如此庞大的牛群，防疫的工作量实在不小。

集市、乡镇级别的官方印鉴很是罕见，笔者曾几次在博养村及其周边街巷打听“分处”旧址，均没有结果。

为何这枚印鉴叫“记”而不叫“章”？简而言之，依古制，官阶九品以上才能称“章”，当年设在长流地区的“防除牛瘟注射办事处”分支机构，自然不到九品，公章只能称“记”。



“琼山县防除牛瘟注射办事处那流市分处之图记”印面。 高永南 摄



“琼山县防除牛瘟注射办事处那流市分处之图记”打章效果。 高永南 摄

文史荟

投稿邮箱 382552910@qq.com

### 偶像级的陶渊明和白居易

“吾于诗人，无所甚好，独好渊明之诗”，苏轼晚年谪居岭南和海南，在经历了多次宦海起伏之后，世间的浮华已很难激起他心中的波澜。古诗成了他内心唯一的安慰。在写给弟弟苏辙的信中，苏轼这样评价古风诗人陶渊明：他的作品，看起来质朴，细品起来却很绮丽；看起来瘦削，实际上意蕴深厚。即使曹植、刘桢、鲍照、谢灵运、李白、杜甫这样的名诗人，也不能与之相比。

苏轼不喜欢陶渊明的诗，在心灵上也与他相通。陶渊明刚直不屈，为了保守气节，宁愿遭受贫穷困苦。自己因为爽直敢言而为同僚所忌，遭逢贬谪，“吾真有此病而不早自知”。

为了向陶渊明致敬，他告诉苏辙，今人只有模仿古人作诗的，却没有与古人遥相唱和的，他开了这个先例，已经作和诗一百零九首，打算将它们整理结束。

苏轼把陶渊明当作老友，穿越时空与之唱和，留下了“和陶诗”两卷135首。这些诗，不少是在海南所写。如《和劝农六首》，当时海南多荒田，而农民多种“留香”等经济作物，以致稻米不够食用，苏轼因而和陶渊明《劝农》诗，倡导农民多种粮食；《和连雨独饮二首》，是苏轼在海南时，生活拮据，不得已“尽卖酒器以供衣食”，因而和陶渊明《连雨独饮》以自娱。

“我甚似乐天”，与李白、杜甫相比，苏轼更景仰的唐代诗人是白居易。苏东坡觉得自己和白居易的求学、成长之路相似；仕途上也有重叠，白居易曾为杭州刺史，260多年后，苏轼也担任杭州知州。更重要的是，两人在性格上都“安分”“寡求”，淡泊名利。苏东坡曾多次表达他与白居易的神似，如“我似乐天君记取，华颠赏遍洛阳春”“平生自觉出处老少，粗似乐天”“出处依稀似乐天，敢将衰朽较前贤”等等。

与传世作品只有125首的陶渊明相比，白居易可谓高产，留下的诗作达3000首。苏东坡自然无法一一唱和，但在诗文中屡屡提及白居易（《苏东坡全集》中有八九十处）。苏东坡肯定不止一遍地读过白居易的诗，熟悉到可以变着法地引用，苏轼诗中，常有“乐天诗云”“乐天亦云”，字里行间透着对这位大咖的赞许。生活中的事物，也能让苏东坡想起白居易。白居易喜欢在庭院中营造小池，苏东坡也新凿小池一方。看着蟾蜍在池中游来游去，他写道：“不作太白梦日边，还同乐天赋池上。”在李白的恣意和白居易的宁静之间，他更欣赏后者。

### 欧阳修，苏轼眼中的天人

年轻时的苏轼，因才华而为前辈们欣赏，如欧阳修等；及至年长，他也乐于与有才气的年轻一代交流切磋，如米芾。他们结成了忘年交。

欧阳修是苏轼眼中的“天人”，苏轼是欧阳修眼中的“异人”。论年龄，欧阳修比苏轼大三十岁。苏轼七八岁开始读书时，就听说有个叫欧阳修的人，文章天下一

流，为人有孟子、韩愈之风。不意二十岁到京城参加礼部考试时，欧阳修就是他的主考官。这次考试的压轴题是策论《刑赏忠厚之至论》，欧阳修读了苏轼的考卷后，大为惊喜，“以为异人”。本来要判为第一的，但又怀疑这是自己门生的卷子，为了避嫌，而改为第二。

交卷后，苏轼没想到自己能中第。就在他打点行李准备回眉山时，得知被“擢在第二”。然而，对这个来自远方的无名小辈，京城很多士大夫并不买账，聚在一起指指点点，“嘲而聚骂者，动满千百”。幸亏有欧阳修的赞誉在前，苏轼才扛住了这些冷嘲热讽，他对欧阳修的知遇之恩非常感激，写了《谢欧阳内翰书》，呈交欧阳修，愿意“长在下风，与宾客之末”。

对于自己一手选拔出的苏轼，欧阳修非常爱护，四年后，又推荐他参加制科考试。诗题有策论六道，结果苏轼表现优异，被评为第三等（前两等虚设），是大宋开国百年来获此好成绩的第二人。苏轼从小视欧阳修为老师：“童子何知，谓公我师。昼诵其文，夜梦见之。”

苏轼后来多次提及伯乐的提携。1090年，苏轼知杭州，为秦少章秀才饯行时，用自己当年的科举经历勉励他一定要坚持下去：“昔吾举进士，试于礼部，欧阳文忠公见吾文，曰：‘此我辈人也，吾当避之。’”1092年，任扬州知州的苏轼，送与自己同年登科的晁端彦回京。在送别诗中提到，他能与晁端彦相识相知，正是因为当年欧阳修赏识自己的才华，认定他将来必将名闻天下，即便是已为天下文宗的自己，“亦须放他出一头地”，因此介绍门生晁端彦前来定交的。

“欧阳公，天人也”，在艺术上，苏轼受欧阳修影响很深，他说自己“作诗颇似六一语”。欧阳修生前，苏轼常与他谈论书画琴诗。欧阳修去世后，他在诗中怀念他，“参寥六一岂念吾”“我怀汝阴六一老”。为了传扬老师的文章之道，他又从欧阳修的儿子处，得到老师的文章七百六十六篇，编辑成书，并作序文。

### 米芾，书坛知己

米芾比苏轼小十四岁，两人因书法相识，友谊跨越二十年。

